

# 新史学五大家

史学史研究室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京) 新登字028号

**新史学五大家**  
史学史研究室 编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开本 12.25印张 312千字

印数 0001—2000

1996年6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一次印刷

---

ISBN 7-80050-707-6/K·106 定价:16.9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我国新史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近世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人才辈出，而这五位史学家是他们中的代表，所谓灿烂群星中的五颗明星。

这五位史学家的史学成就与史学思想，是我国史学中的宝贵财富。对其研究、了解、学习，取其精华，以为营养，从而发扬光大，继往开来，则我国史学必然长足地发展。

对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学及时地认真研究和评介，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我们水平有限，研究刚刚起步，本书只是简略的评介。希望读者与方家指正。

本书各部分的执笔人如下：《郭沫若的史学》，叶桂生；《吕振羽的史学》，田人隆；《范文澜的史学》，陈其泰；《翦伯赞的史学》，刘茂林；《侯外庐的史学》，李桦。

全书由施丁负责定稿，叶桂生同志对本书的写作、定稿也付出了一定的心力，翟清福协助做了具体工作。

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得到上级的亲切关怀；并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负责人沈恒炎同志和编辑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施 丁

1994年5月31日

# 目 录

前言	施 丁
郭沫若的史学	( 1 )
第一章 郭沫若在新史学上的地位	( 1 )
一、形成期的开拓者	( 2 )
二、发展期的实践者	( 7 )
三、全面建设期的推动者	( 12 )
第二章 郭沫若史学的三大成就	( 18 )
一、古史分期说的确立	( 18 )
二、先秦诸子说的风采	( 24 )
三、历史人物的画卷	( 33 )
第三章 郭沫若史学思想的脉络	( 45 )
一、“动”与“自我”的传统精神	( 45 )
二、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	( 49 )
三、以人民为本位的原则	( 54 )
四、所谓“帝王”新评考	( 59 )
五、曲折期思想的败兴手法	( 63 )
第四章 郭沫若对史料的处理与运用	( 69 )
一、文献上的辨伪	( 69 )
二、古文字的运用	( 73 )
三、古籍整理的方法	( 79 )
吕振羽的史学	( 83 )
第一章 集革命家与学者于一身	( 84 )
一、报国之志的萌发	( 84 )

二、挫折与摸索·····	( 86 )
三、人生的转折·····	( 90 )
四、学者与革命家一身二任·····	( 92 )
五、艰难的岁月·····	( 96 )
六、高风亮节·····	(100)
<b>第二章 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索与研究·····</b>	<b>(103)</b>
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求索·····	(103)
二、殷商社会性质的辨正·····	(109)
三、西周封建论的创立·····	(114)
四、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开创性研究·····	(118)
五、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125)
六、中国历史“停滞论”的批判·····	(131)
<b>第三章 开拓者的启示·····</b>	<b>(140)</b>
一、有感于时代使命·····	(140)
二、重实践 轻教条·····	(144)
三、人民本位·····	(149)
四、史与论结合的典范·····	(154)
<b>范文澜的史学·····</b>	<b>(161)</b>
<b>第一章 学者和革命者的一生·····</b>	<b>(161)</b>
一、青少年时代·····	(161)
二、国学名家·····	(162)
三、在斗争中磨炼 树立唯物史观·····	(164)
四、建国后专心著述·····	(167)
<b>第二章 《中国通史简编》</b>	
——当代史学的煌煌巨著·····	(169)
一、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成就·····	(169)
二、《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理论指导·····	(178)
三、历史主义的出色运用·····	(182)

四、对制度沿革和民族状况的记述·····	(186)
五、对传统文化的精采分析·····	(193)
<b>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开拓意义·····</b>	<b>(199)</b>
一、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激烈斗争·····	(199)
二、奠定基本格局 前驱先路的功绩·····	(203)
三、开阔的视野 卓越的史识·····	(212)
四、近代史分期的主张·····	(214)
<b>第四章 经学史研究·····</b>	<b>(218)</b>
一、首创性的总结·····	(218)
二、深层次的剖析·····	(221)
<b>第五章 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b>	<b>(225)</b>
一、求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之“神似”·····	(225)
二、论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爱国主义·····	(230)
三、百家争鸣和厚今薄古·····	(237)
四、“文”“史”兼通优良传统的发扬·····	(240)
<b>翦伯赞的史学·····</b>	<b>(245)</b>
<b>第一章 坎坷的史学之路·····</b>	<b>(245)</b>
一、在时代大潮中求索·····	(245)
二、在革命风暴中追寻·····	(252)
三、在新航路上顶风航行·····	(259)
<b>第二章 新史学的又一块基石——两部中国史纲·····</b>	<b>(267)</b>
一、第一部《中国史纲》·····	(267)
二、第二部《中国史纲要》·····	(272)
三、南明史与末代王朝的研究·····	(273)
四、倾注心血的民族史·····	(277)
<b>第三章 光辉的历史思维·····</b>	<b>(281)</b>
一、《历史哲学教程》·····	(281)
二、对传统史学的吸收与扬弃·····	(291)

三、高举历史主义大旗·····	(294)
<b>第四章 出类拔萃的史学方法</b> ·····	(304)
一、搜集与分析史料的方法·····	(304)
二、从古典文艺作品中寻找真史·····	(308)
三、坚持史论结合·····	(312)
四、历史主义的方法·····	(314)
五、以文入史 声情并茂·····	(315)
<b>侯外庐的史学</b> ·····	(317)
<b>第一章 矢志翻译《资本论》</b> ·····	(317)
一、少年时代的追求·····	(317)
二、习译《资本论》的十年·····	(320)
<b>第二章 史学生涯的发端</b> ·····	(327)
一、由经济学到史学·····	(327)
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特殊路径的探寻·····	(333)
三、关于思想史研究的发轫·····	(340)
<b>第三章 《中国思想通史》的编撰</b> ·····	(350)
一、《中国思想通史》一至三卷的编撰与修订·····	(352)
二、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	(357)
三、《中国思想通史》四、五卷的编撰完成·····	(366)
四、未能最后完成的“近代编”·····	(369)
<b>第四章 继续开拓与总结</b> ·····	(375)
一、继续开拓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375)
二、总结史学研究的经验得失·····	(377)

# 郭沫若的史学

## 第一章 郭沫若在新史学上的地位

恩格斯曾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sup>①</sup>在中国，的确出现一位巨人——郭沫若。他生于1892年11月16日，故乡是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沫若的成长正是中华大地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此时，在中国经历了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世界注目的变化。他的一生正是这种变革的缩影。从童年和少年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青年时革命人人生观的确立、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和新中国的栋梁，一直到晚年的追求，郭沫若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对于他的生平学术界有不少的评述，可从略。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越的著名学者，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在中国历史学上，郭沫若是现代的一位大家，能与古代的司马迁、近

---

<sup>①</sup>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代的梁启超等相比。他的著作等身，是许多学者都赞叹不已。人们要说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即：其一，他对新史学，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壮大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二，在史学的一些领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了这肥沃的园野。这两方面的情况不可混淆，但又有必然的联系。此第一章先叙述其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其后，它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全面建设、曲折和蓬勃向前的历程。郭沫若就是其中几个阶段的重要参与者。他的作用和地位是旁人不能代替的。

## 一、形成期的开拓者

历史学在中国是一门悠久的学科，自古以来有着优良的传统。一切虚无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几千年来，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视野的狭小，以及知识结构的有限，又不能使得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而独立存在。中国资产阶级史学产生之后，有了很大的转机。他们曾提出历史就是“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这是进步的史观。然而，他们几乎没来得及从历史的本身去证明和扩大这种史观的正确性，就遇到了唯物史观的挑战。在此，很多人又退步了。比如，有人说：“故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文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sup>①</sup> 在一些史家看来，历史依然是个不可琢磨的现象，无科学所言。梁启超在后来也是此种观点。20年代以后，情况大不相同了。近代大工业生产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随之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可靠的阶级力

<sup>①</sup>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局1927年版第2页。

量也已存在，而且，这个阶级和阶层的代表的文化素质不断地提高，唯物史观逐渐为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型的历史学萌芽就自然产生了。这里，李大钊是一个代表。他认为：“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sup>①</sup>这样就区别新史学与旧史学的不同。李大钊不仅撰写《史学要论》和《史学思想史》的理论著作，而且结合革命的实践，论证一批近代史上的事件，推动新史学的进程。可惜，李大钊牺牲太早，还没有从具体的历史本体找出符合规律性的结论。所以，他的新史学是萌芽期的产物。这是1928年以前的状况。中国新史学真正形成一门科学，并有突破性的进展，应该说，是郭沫若代表的时代。

早年，郭沫若还在日本读书期间，与创作诗歌的同时，还写下几篇的史论。这些文章明显有史的意识，也对马克思、列宁的人格和理论表示向往。但是，在思想倾向上基本没有彻底摆脱旧史观的束缚。后来，人生观确定，他直接投入大革命的洪流，直至失败。这一段时间，丝毫不曾发现其治史的痕迹。在上海养病和避居日本的最初半年里，他用心地学习几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原著，特别还手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唯物史观”原理。在此基础上，他决心从中国历史研究出发，找到自古到今的社会发展的法则，从而，回答目前许多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从1928年7月至1929年11月，不到一年半的时光，完全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等五篇论文，并合编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专著，于1930年3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发行。

该书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运用古代以来的文献和

<sup>①</sup>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选集》第6页。

甲骨文、金文的资料，第一次把中国的历史从原始公社制度变成奴隶制，又向封建社会转移，一直到现代（指1928年以前）的全部过程，交待一清二楚。中国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经济形态的论断是靠得住的。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是毫无道理，错误的。作者明确地表示，撰写的目的是：“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sup>①</sup>本来，远古的资料是枯燥乏味，又有神秘莫测，使人难于引起兴趣。可是，现在在作者的笔下却是另一番境界，生动而又有哲理，读起来正是“鸡鸣不已”，打动许多人的心灵。该书一出世，宛如一声惊雷，震撼着整个的史学界、文化界和一般读者。有人说：“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正象打了强心针剂。”<sup>②</sup>从30年代一直到抗战的相持阶段，这本书的影响始终不衰，它代表了几个时代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倾向。高度的评价是一直不停。如，1932年文甫先生在《郭沫若评传》一书中说：“对于中国社会之科学的研究，是三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潮点。其在历史方面，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sup>③</sup>1937年，何干之在一书中说：“他（指郭沫若）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所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还说：“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sup>④</sup>类似的提法还可以举出一些。我们说，郭沫若成了新史学形成期的开拓者是不过分的。

---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② 尹达：《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尹达史学论著选集》第414页。

③ 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评传》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219页。

④ 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105、103页。

该书在国内出版还引起一些反对共产党和所谓无党无派的学者注目。原来，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当时，进步的经济学家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与之抗衡。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趋向，其中心是近现代社会现象。自然，这一举动又促进史学界的关注。中国远古以来的历史状况是需要有个认识和判断。最早出来发表文章的是陶希圣。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专著，名义上也标榜以“唯物史观”为原则，把古今历史分成若干段落。紧接着，郭沫若的三篇重点（即《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陆续在《东方杂志》和《思想》月刊登出。1929年5月，郭沫若又看到陶希圣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出版。读了前面两章就发现错误百出。因此，他以杜荃为名，写了《读〈中国封建社会史〉》。文章批评陶氏不承认奴隶社会存在的论断。“特别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崩坏，封建势力还存在着’的这样的结论，这是有点奇怪的。”<sup>①</sup>实际上，在史学界正式排出两种史观的对立局面，而郭书出版发行，更加使矛盾公开化。持反面观点的人是极力地抨击郭沫若。如说：“他（郭沫若）这部书已经连印四版，销去六七千册，不独贻误青年，并且作了某派牢不可破的理论的基础，我们为责任心所驱策，又怎能不再再接再厉地干一下呢？”<sup>②</sup>于是，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展开“中国社会史论战”。由于各种原因，史学界的一些进步的学者都没有参加，因此，讨论显得淡墨。“论战”的学者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又短暂、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论战”中，他们的靶子是郭氏的《中国古代

① 杜荃：《读〈中国封建社会史〉》，载《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1929年。

② 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神州社1933年版第172页。

社会研究》。“论战”者旁征博引，一味地在“理论”上兜圈子，不注重史料的占用，几乎变成经院式的空谈。不到二年就无声无息地收场了。“论战”并没有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驳倒，反而是在读者中增加了信任感。当时北大的教授董作宾说：“他（郭沫若）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sup>①</sup>这“体系”是符合古史的内涵的。郭沫若的功绩是前无古人，而今对新史学的开创又提供了道路。

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十分欣赏在甲骨文、金文上的整理与运用。它使先秦以前的历史更加扎实和可靠。这是新史学形成期的又一大成就。当然，他又是这方面的开拓者。甲骨文发掘在近代，金文的研究早在宋代就开始，而到了郭沫若的时代才真正把这种古文字放在古史研究领域，进而担当起说明先秦以前的法则、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郭沫若在古文字学上是做了突破性贡献的。

此外，在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郭沫若还撰写11篇文章，内容丰富。大体有四方面的论述，即：其一，对过去“论战”观点进行反诘和论证，如《社会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关于论究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读〈实庵字说〉》等；其二，有关古代问题的辨鸣，如《答马伯乐先生》、《责问胡适——由当前的文化动态说到儒家》等；其三，补充和纠正先秦以前的若干提法，如《周易的构成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其四，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分辨与评价，如《老聃·关尹·环渊》、《屈原时代》、《隋代大音乐家——万宝常》等。这些都是新史学形成期的成果。毫不足怪，此期郭沫若著作还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是错误。正如郭说：“二十多年来（指1930年著作问世以来）我自己的看法已经改变

---

<sup>①</sup>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台湾大陆杂志社1960年版。

了好几次，差不多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sup>①</sup>今天，我们来看这一幕幕的“斗争”，目的是学习和发扬他的披荆斩棘、勇于批评的精神，把这位开拓者的风格永远保留下去。

## 二、发展期的实践者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后，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陆续到延安和重庆，以《解放》和《群众》等杂志为阵地，开始了继续研究历史。这时，郭沫若主要在从事宣传抗战工作，暂且放弃了历史上写作。“皖南事变”以后，为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动员进步的知识分子把精力投入学术研究。为此，郭沫若又重提研究的事业，在新史学的发展期担当起实践者的任务。

郭沫若以文委会的名义，曾邀请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等来讲学。他自己更是力行此事。1942年1月，他开讲甲骨文字，为期三日；夏季，又讲孔子评价；8月，报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及自己的古代分期说，为期三日；同月，还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专题讲座，活跃了学术气氛，更使学者比此了解各自的观点，为下一步真正的研究和讨论奠定了基础。在庆贺郭沫若的五十寿辰时，周恩来也特别对他提出了希望。恩来说：“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sup>②</sup>郭沫若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在五年内，他写出论文近20篇，大部分分别编辑在《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三部专著。书中除掉单独考释文字之外，已经包括研究的三个系列，即：古史分期、先秦诸子、历史人物；其中，分期由来、孔墨之道和屈原评定等又是与他人有分歧，并争辩的。郭

<sup>①</sup>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引言，《沫若文集》第14卷第2页。

<sup>②</sup>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载《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沫若在此做到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独树一帜，形成一家之言。这样就推动史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上面的这些成果几乎是他一辈子研究的主要部分，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有所交待。这里，关于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需要特别叙述一番。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成份及其起义和战争是新史学涉及的一大项目。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明确地阐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①</sup>毛泽东还认为，由于没有先进的阶级做领导，农民的起义和战争又最终必然失败，当改朝换代的工具。这一总体的又是理论的概括，第一次给予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1943年，在重庆的陈家康发表《明末农民运动研究》一文，也指出：“中国社会自从进入以封建制度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历史阶段以后，农民运动就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sup>②</sup>陈家康还具体地把明末农民运动划分为两大时期，即崇祯时期和南明时代。前者又分三个段落，是以反抗当时的社会制度为主，领袖人物是李自成；后者也分两个段落，是以反抗外族侵略为主，领袖人物是李定国。可以看出，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步的史学界已经开始向这一领域进军了。郭沫若是这一进军的佼佼者。

1944年1月，正是明朝覆灭的三百年纪念日，当然，也是明末农民战争的胜利和失败的年月。当时，《新华日报》负责人想借此纪念之事，活跃一下对明亡史的讨论和研究。刚好，郭沫若又有偶然的看到《剿闯小史》（抄本），引起对明末农民战争的莫大兴趣。原先，他想以李岩和红娘子为线索，创作史剧，搬上舞台。后来，他又查找到一些南明的史料，包括翦伯赞也帮忙，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② 陈家康：《明末农民运动研究》，载《群众》第8卷第1、2期，1943年。

增加写史论的愿望。郭沫若本来是以先秦前后的历史作为研究重点；现在，响应《新华日报》的号召，打开研究明末农民战争的头炮。3月10日，他的大作《甲申三百年祭》就脱稿，经再修改和董必武审阅，19日开始由《新华日报》连载。同时，重庆的“说文社”书店根据山东图书馆所藏的《剿闯小史》（抄本）10卷本重新排印，邀请郭沫若写“跋”。他详细地考证和校正，认为“作为平话小说，实甚拙劣，但可作为史料观。”特别是“观其前五卷专叙北方事以续成之，一录一笔颇为瞭然。”<sup>①</sup>因此，他对全书进行了订正，并施标点，以发掘野史和小说当中的有价值史料。二年之后，他又写《关于李岩》。郭沫若的论文算是在重庆史学界开了先例，紧接着，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宗颐的《三百年前》、鲁亚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的时代意义》等纷纷连载，一时形成了热潮。

《甲申三百年祭》开头就说明了作者的意图。论文说道：“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异族的人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sup>②</sup>这里条理分明，抓住全文的纲。作者是表彰明末农民革命的光辉胜利，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必然失败的道理。文章的结尾又这样写：“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王，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早迟也会变质，而他必然也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说是断无例外。”<sup>③</sup>这表明，封建制度

① 《剿闯小史》郭沫若“跋一”，说文社书店1941年版第136页。

② 《甲申三百年祭》，《沫若文集》第12卷第501页。

③ 《甲申三百年祭》，《沫若文集》第12卷第528页。



下的农民革命虽然有成功的希望，但是，社会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变动。因此，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改朝换代，农民的利益依然无法保障。从作者前后两段的结论来看，《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目的是十分清楚，其理论倾向也无疑是正确的。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借用了《明季北略》、《明史》、《甲申传信录》和《剿闯小史》等可信史料，对明朝的腐败、社会的动荡、“流寇”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农民领袖的李自成的战功与品德、杞县举人李岩的反叛与为民而战等等，都比较详细而生动的描述，引出的结论当然是可靠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成功之作，博得读者的赞同。正是如此，该文也遭到某些文人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力反对。当时，由陶希圣执笔，在《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直接对着郭沫若进行攻击。

“社论”认为，郭文是在“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李自成在他们看来是“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的罪人，是“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如果，表彰了李自成的战绩，“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sup>①</sup>显然，在如何对待明末的农民革命问题上，两者选择了根本对立的史观。这是当时在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是获得大多数学者和读者的支持。至于，“社论”批评郭沫若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明人一看，无疑是自己的写照。这次企图“围剿”郭沫若的有陶希圣、叶青等，除了登载“社论”以外，还有《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战败主义与思古幽情》、《‘国将兴，听于人’》、《甲申史料小辑》、《甲申一贼》等，并特订一册小书。气焰嚣张，但效果很差。正如郭沫若说：“我并不萎缩，我只感觉着论客们太可怜了，竟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sup>②</sup>

在延安，情况却是大不相同。《解放日报》重新转载该文，“编

① 《纠正一种思想》，《中央日报》社论1944年3月24日。

② 《答费正清博士》，《沫若文集》第13卷第140页。